

论价值和分配理论的争论

王璐

(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 天津 300071)

摘要: 在经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 价值与分配理论一直是经济学纯理论争论的核心, 新古典学派、古典学派和马克思经济学都分别从不同的思路 and 角度对这一问题给予了不同的解释。在长期的价值与分配理论的争论之中, 新古典经济学由于其自身的逻辑悖论而无法自圆其说, 古典和马克思经济学虽然从研究方法上给予我们很多启示, 但却没有强调现实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货币经济的本质。本文认为, 运用古典的分析方法、结合凯恩斯对货币经济的分析、并加入以利润为基础的成本-收益核算所形成的宏观经济的分配理论, 才是可以更好地解释现实货币经济或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价值和分配理论。

关键词: 价值与分配; 新古典学派; 古典学派; 马克思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 F **文献标识码:** A

一、引言

回顾两个世纪以来经济分析的发展历程, 价值和分配理论作为纯理论争论的一个核心与焦点, 经历了各种不同分析方法的更迭与交替, 至今依然是困扰着诸多经济学家的难题。无论是从斯密(Smith)、李嘉图(Ricardo)到马克思(Marx)、以及后来的斯拉法(Sraffa)所遵循的古典传统, 还是从庞巴维克(Bohm-Bawerk)到瓦尔拉(Walras)、马歇尔(Marshall)等所推崇的新古典学派, 都以不同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对这一核心理论做出了自己的解答。总的来讲, 不外乎是两种分析方法的对立: 一种是新古典传统的“技术关系”分析, 另一种是古典传统的“社会关系”分析。即: 新古典的价值和分配理论建立在代表技术关系的总量生产函数基础之上, 是一种用相对价格指导稀缺资源有效配置的边际理论, 但一旦由单一产品模型扩展为更接近于现实生活的异质品模型时, 则会由于自身的逻辑悖论而无法自圆其说; 古典理论及马克思经济学的价值分配理论的核心则在于总量分析, 其宏观总量的意义源自于资本主义特有的经济关系, 与技术无关; 后来, 古典学派的这一研究方法在斯拉法那里得到了复兴, 他在投入-产出矩阵的基础上加入了表明特定经济关系的统一利润率来决定其价值和分配。可以看到, 虽然上述古典的分析传统在一定程度上触及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 但却都没有认识到这种经济关系在总量意义上的特殊性在于其货币经济的本质, 即以统一的货币利息率加总而得到的一种货币量值所表示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因此, 运用古典的分析方法, 加入凯恩斯对货币经济的分析, 尤其是加入以利润为基础的成本-收益计算, 才能更为有效的解释现实的宏观经济。

二、新古典分配理论

1、边际生产力分配论

长期以来, 新古典理论一直居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地位而为人们所广泛接受。经过马歇尔等人的不断完善和发展, 新古典理论已然渗透到了现实生活的各个角落。新古典经济学, 又可称为“稀缺经济学”或“效用经济学”, 它通过集中研究在既定资源之下物物交换中的边际效用和需求, 提出了一个有利而灵活的方法, 即边际原理。借助于它, 新古典主义者最终成功的澄清了斯密、李嘉图和穆勒(Mill)都没有加以澄清的使用价值、交换价值和生产成本如何能够同时存在的问题。用现代术语来说, 新古典学派的核心观点是: 物品的定价和生产要素的定价系由共同的原则所支配着, 主要是由最大化目标的经济行为者的供给和需求的力量决定。这其实也正是其分配理论研究的切入点。¹ 但是, 作为纯理论的一个核心理论, 人们对于新古典分配理论所构成的基础则一直处于争论之中。一些人把边际生产率视为其基本特征, 另一些人认为总量资本或者总量生产函数(甚至是柯布一道格拉斯形式的函数)为

基本的特征，还有一些人则认为新古典分配理论是一般均衡论。但不论其形式如何，较为一致的看法是，新古典理论研究的出发点是一套技术关系。通过这套技术关系，加入资源的稀缺性、要素和产品的可替代性、厂商和消费者的最大化行为假设，运用边际原理即可推论出新古典的边际生产力分配论。

假设厂商用一笔货币去购买两种生产要素——劳动和资本品，并按照利润最大化原则组织生产单一产品——谷物，那么在完全竞争条件下的收入分配将取决于要素的边际生产力。这样，由要素边际产品价值等于要素边际生产力与产品价格之乘积的边际原理，即是新古典的边际生产力分配论，即这里的收入分配取决于要素的边际生产率或相对价格，相对价格与收入分配是一致的，完全由技术关系决定。假定表明投入与产出关系的生产函数可以说明这种技术关系，以 Y 、 K 、 L 分别代表企业的产出、资本和劳动力，则整个经济的技术总量可表示为： $Y=F(K, L)$ 。该生产函数满足不变规模报酬和资本与劳动之间的递减边际替代率。其中，资本是一个存量，即给定的生产要素，像土地和劳动一样，其计量单位使用实物数量来表示和不考虑其生产成本。这样，在产品价格为 p 的情况下，工资率 $w=p(dQ/dL)$ ，利润率 $r=p(dQ/dK)$ 。根据欧拉定理(Euler's Theorem)，若生产函数为一阶齐次性，则产品总构成成为：

$$PQ=PMPI+PMPk, \text{ 或者 } Y=wL+rK$$

其中，工资率表示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利润率表示资本（实物资本或资本品）的边际生产率。与劳动的工资和土地的地租相同，利润率作为资本品的价格仅仅是租金，因而与资本品的生产成本以及消费的时间偏好无关。所以，这里存在着一系列微观生产函数，却不存在资本品资本化的价格，把各种资本品加总为一个总量资本就是没有意义的。显然，这样一种新古典分配理论所表明的是，生产过程中的分配完全取决于所采用生产函数的技术，其中无论是哪种生产方式，都可以使参与生产过程的要素根据新古典的边际生产力原理得到自己所作贡献的份额，而和特定的社会关系无关。不过，如果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个新古典的边际生产力理论其实并不能算是一个真正的分配理论。根据著名史学家布劳格（Blaug, 1997年）的解释，分配理论应当是关于个人的收入分配问题或者是收入在工资、利润和地租之间的分配比率问题的理论，但上述边际生产力理论只是一个要素的定价理论，并不与收入份额的分配有关，所以充其量也只能是一个伪分配理论。² 因此，用这样一个新古典的边际生产力理论来解释分配以及与分配相关的各种问题，也就不可避免的会出现各种逻辑不一致的问题了。

2、 r 与 K/L 悖论和资本加总问题

1972年，哈考特（Harcourt）曾经针对新古典的资本与分配理论，归纳出以下几个具有代表性的新古典命题：（1）在利润率 r 与人均资本量 K/L 即资本密度之间存在着稳定的逆向单调关系；（2）在利润率 r 与产出-劳动的比率 Y/L 之间固定的存在着反向单调关系；（3）更低的利润率 r （通过投资于更机械化和更迂回的生产方法）与更高的持续稳定的人均可能最大消费，即工资率 w 相联系；（4）国民收入 Y 在工资 W 与利润 P 之间的分配完全由要素供给及其边际产品来决定。³ 一般认为，这种归纳比较符合斯蒂格勒（Stigler）对新古典理论的重新表述。其中，第4个命题所表明的边际生产力分配论的思想，作为新古典收入分配理论的核心，是建立在前三个命题的基础之上的；而前三个命题的实际含义其实就是利率与资本深化之间的反向关系，即 r 与 K/L 的反向变动。这一反向单调关系一直以来被新古典经济学者们视为理所当然的规律而备受推崇，原因在于他们普遍认为，通过采用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可替代性可以推出这个关系。因为随着 r 的下降，资本便会替代别的生产要素，如劳动和土地等，从而使资本的数量相对于劳动的数量增加，其结果必然导致 r 与 K/L 之间的反向单调关系。

然而，20世纪50-60年代由罗宾逊夫人、斯拉法、帕西内蒂等新剑桥学者所提出的资本倒流（Reverse Capital Deepening）和技术再转折（Reswitching of Technique）的事实，却使得上述新古典的信条——建立在“替代原理”基础之上的 r 与 K/L 的反向单调关系受到了极大的冲击，从而使得新古典的收入分配理论只能在单一产品模型中成立，却无法适用于

异质品模型。一般来讲，单一产品模型与中间投入和劳动之比 K/L 始终不变，即各部门资本构成 C/V 完全一样的特征保持一致。此时，整个社会可被设想为一个单独部门，也可以理解为平均有机构成部门。这样， r 的同比变动被 w 的同比变动所吸收，所以 r 的变动不影响相对价格 (w 和 r) 的变动。因而，在选择不同技术时，资本与劳动之间必然有稳定的连续替代，从而 r 与 K/L 之间可以保持稳定的反向单调关系，不会发生资本倒流和技术再转折的现象。这时，工资率 w 与利润率 r 之间有着线性的逆向关系：即线性工资-利率 ($w-r$) 曲线，而该曲线上每一点的 K/L 是相同的。假定商品是新古典生产函数生产出来的，且规模收益不变，由上述新古典的边际生产力分配论可知：

$$Q=rK+wL, \text{ 或者 } q=w+rk$$

对上式求导可得：

$$dq=dw+rdk+kdr, \text{ 或者 } 1=dw/dq+r(dk/dq)+k(dr/dq)$$

可以看到，只有 $dw/dq+k(dr/dq)=0$ ，即 $-dw/dr=k=K/L$ 时， $r(dk/dq)=1$ 即 $r=dq/dk$ 才成立。也就是说，只有 $w-r$ 曲线上每一点的斜率 $-dw/dr=k=K/L$ 时，资本的边际产品价值才会等于利润率 r 。而 $dw/dr=-k$ 恰恰指的是线性的 $w-r$ 曲线，显然这就要求 $w-r$ 曲线是线性才可保证新古典边际生产力分配论的成立。⁴ 然而，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情况。因为 $w-r$ 曲线为线性与 K/L 的始终不变是一致的，这只有在单一产品模型中才会成立。一旦脱离单一产品模型，即脱离各部门中间投入和劳动之比 K/L 始终不变这一平均有机构成的前提， $w-r$ 曲线就会呈非线性的形式，而这种非线性的 $w-r$ 曲线在多重可供选择的技术条件下，随着利润率 r 的变动，必然会发生技术再转折和资本倒流的现象，从而使得投入比例变化的方向不可能再明显地同所谓的“要素价格”的变化有关。这样，新古典学派根据供求原理对分配所作解释的中心部分，即建立在替代原理基础上的 r 与 K/L 之间的反向单调关系就不再成立了。既然 r 与 K/L 之间失去了变动一致的规律性，新古典的边际生产力分配理论也就不可避免的出现问题 (Howard,1979)。

实际上，在单一产品模型中，由于不存在异质资本品价值计量的矛盾和可以保持 K/L 的一致性，从而生产函数的使用是毫无疑问的，从而建立在微观生产函数基础上的新古典分配理论自然也是成立的，其资源配置只需要表明稀缺性的相对价格而根本不需要总量。然而，一旦进入异质品模型，各种异质的资本品则只能使用微观生产函数，且每一种资本品将有自己的生产函数和自己的收益率，就不可能再使用总量生产函数来讨论资源配置问题，而且这个“总量资本”和边际生产率也是无法表示的。其中的问题出在“资本”的定义上。在新古典理论中，资本只是一种与土地、劳动并列的普通的生产要素。然而，作为一种物质资本的投入要素，其各种构成并不是同质的，它们缺乏共同的物质基础。这就意味着不能把用于投资的各种具体物资拼凑成一个生产要素，也就不能成为一个独立的边际生产力范畴，更不能依据它来决定分配的份额。但在现实经济中，资本总是由异质的资本品构成的，所以，如果承认资本品的异质性，并允许其用于不同生产目的的前提存在，那么在新古典一般均衡的理论框架内，仅应用其反映技术关系的生产函数，并没有办法解决加总问题。另外，这个“资本”与古典学派和马克思经济学中对作为一种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预付资本”的理解也是完全不同的。实际上，如果脱离了资本主义特有的经济关系，如果忽略了资本主义制度对收入分配的作用，则资本的生产能力就会被视为是一种纯技术性的或物质的属性而与社会生产关系无关。这样，按照新古典主义的观点来看生产过程，诸如“资本”、“劳动力”这些要素经过神秘的转换即产生了某种输出，整个生产就成为一种自然的或超社会的过程，生产中的社会关系就消失了，所谓的资本也就变成了与历史和时间无关的东西。⁵ 一旦离开了真正的历史和真正的社会关系，新古典理论的资本及分配理论也就脱离了现实，没有了实际意义。

举一个异质品模型为例。假设有两种产品，一种是小麦，另一种是燕麦，它们都可以用于资本品（如种子）和用于消费，用于资本品的技术关系由新古典生产函数决定。其中，两种产品在一定的时间内各自的利息率不同，分别取决于各自的边际生产率和人们的消费偏好与时间偏好。因为各种资本品不是同质的或不存在各种资本品的资本化价格，从而不能用一

个价值单位来计量和获得总量。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可以假定任意选择一种商品的自己的利息率作为一般利息率，以表示总量资本的边际产品和人们的消费偏好，而另外一种商品的利息率则可以通过采用对特殊商品的自己的利息率贴现而得到其价格。即公式： $K=R/r$ ，其中， K 为资本品价值， R 为资本品在一定时期的收益， r 为利息率。从而，各种资本品按照这种贴现价格计算的收益率是一致的，因为这个一般利息率可以是人们任意选择的一种产品的自己的利息率。然而，由于各种资本品的自己的利息率并不相同，从而采用不同的商品作为一般利息率的标准，将会有不同的利息率和按这一利息率计算的宏观变量（如增长率、收入、资本存量价值、储蓄和投资等等）。特别是当脱离了稳定状态时，由于这种特殊商品本身的生产率会发生变动，不可能用于价值标准而与现实相一致。同时，在新古典一般均衡的理论中，由于每一种要素的收益率都是自己的收益率，并不存在统一的收益率，这样，通过求解各种要素的边际生产力所得到的要素分配额，在异质品模型中就是不正确的。因而也就不需要用一种假定的总量生产函数来表示加总的宏观变量，因为实际生活中根本不存在这样一个表明技术关系的总量生产函数。

三、古典分配理论

1、 剩余分析法

与新古典主义不同，古典学派不再专注于“稀缺商品”，也不再使用生产要素的“替代原理”来解释收入分配，更多的是从社会关系的角度采用“剩余”的分析方法研究分配问题。所以，古典经济学又称作“剩余经济学”，即有关剩余产品产生和分配的经济学。该方法为从斯密到李嘉图以来的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以及后来的马克思所遵循，同时也是斯拉法所恢复和极力推崇的。只不过，“从亚当·斯密到李嘉图以来的古典经济学家，对分配理论和价值理论的这种分析方法，在‘边际’方法出现以后，它被遗忘了”（斯拉法，1962年）⁶。需要强调的是，与新古典理论研究的表明相对价格的技术关系不同，古典经济学的剩余分配理论从社会关系的角度出发研究资本主义的收入分配关系，其社会产品的分配，是在资本主义的条件下以一定的方式同劳动在生产中的作用、以及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格局联系在一起。其中统一利润率假设的存在，表明了资本主义生产只是为了利润、而利润来自于雇佣劳动这种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特殊性质，这一点对于古典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学都是至关重要的。

概括地讲，研究分配问题的古典学派的方法建立在把年社会产品区分为两部分的基础之上：一部分是社会再生产所必要的部分，一部分是可以为社会自由处置的部分，并构成了它的“纯产品”或“剩余”——社会产品除去工人必要的基本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的更换以后所剩余的部分。即：

$$\text{社会产品}-\text{必要消费}=\text{工资之外的份额（剩余）}^7$$

其中，解释决定着剩余产品的多少和它在各个阶段中进行分配的条件，是古典学派理论的目的。按照李嘉图的说法：“确立支配这种分配的法则，乃是政治经济学的主要问题”（李嘉图，1963年）⁸。在这里，将工资之外的产品份额看作“剩余”方法的特征在于，认为实际工资率和社会产品在工资之外的产品诸份额决定之前可被预先决定。显然，这与实际工资率和边际利润率是在劳动和资本相对稀缺性的基础上、对称并同时加以确定的新古典供求分析方法完全不同。相反，在古典学派的方法中，对于两个分配变量中一个变量的解释，是独立于社会产品和另一个分配变量之外，并且另一个变量是作为一个剩余而加以解释的。通常是把实际工资视为其中独立确定的量和既定的量，并认为其正常水平由“最低限度的生活资料”决定，包括利息之内的正常利润则被确定为一种余量，工资率的水平就因此成为正常利润率所赖以决定的唯一条件。⁹ 不过，需要说明的是，能够与古典剩余理论保持逻辑一致的，是古典学派“预付资本”的思想。因为对于以特定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为研究对象的古典学派和马克思经济学而言，当资本主义的生产目的是为了利润而采用雇佣劳动的形式时，资本就不再是新古典理论中与土地、劳动并列的普通的生产要素，而是一种支配劳动的手段，即资本是一笔对货币工资的预付。而资本家之所以用货币购买资本品或生产资料，也只是对生产资本

品的劳动和以前劳动工资的预付，其目的都是为了获取利润，从而存在着“自然利润率”。这种自然利润率来自于这样一点，即除非能够获取利润，否则资本家绝不会为工人垫付工资。因此，在古典理论中就需要一种由社会关系所决定的利润率或工资率，但这种利润率并不依赖于技术关系或与技术关系是完全无关的。

2、斯密

事实上，体现古典理论特征的“社会剩余”概念最早源自于重农学派。在《经济表》中，魁奈曾将剩余和土地所有者的社会产品份额相联系。亚当·斯密扩展了这一概念，他指出，剩余源自于总的生产而不仅仅是农业。于是，利润作为剩余的第二个组成部分与地租同时出现，从而为古典经济学家一直到李嘉图的分配理论提供了基础。在此之上，斯密对资本主义生产的特征加以理论化。比如：在生产方面，他提出了“净产品”的概念，并提出了自由的劳动者与“资本家”的出现；在分配方面，他提出了三个社会阶层和他们各自的收入（工资、利润、地租），而且其来源和性质各不相同；在交换方面，他提到了“自然价格”与“市场价格”这些有关的范畴，并把自然价格定义为“自然工资率、利润率和地租率的总和”，以此形成了斯密的所谓“生产成本理论”（Hollander, 1973）¹⁰，即：

$$P=W+R+II \quad (P: \text{自然价格}; W: \text{工资基金}; R: \text{租金}; II: \text{利润})$$

其中，工资、利润、地租的自然水平是互相无关、各自单独形成的，由于每一个组成部分都独立于技术，因而是一种总量的收入分配。作为一个古典学者，斯密将其中的核心部分——工资率和利润率的确定与“劳动”联系在了一起。斯密认为，在资本积累出现以前的早期社会中，劳动者拥有生产方式的所有权，所得收益与其投入努力成比例，所有的收入都来自于劳动，所以劳动者可以获得他生产的全部产品，而不存在地租和利润，即：

$$Y=W=wL \quad (Y: \text{总产出}; w: \text{实物工资率}; L: \text{就业劳动者人数})$$

这就是斯密“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或“实体劳动”的含义，霍兰德（Hollander）称其为“纯粹劳动的交换价值理论”（Hollander, 1973），显然这种社会里并没有剩余存在。然而，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一旦资本被积累起来，商品的价值决定和分配就不再按照这个原则进行了。因为资本主义体系下的生产方式只为少数可以通过预付工资来雇用劳动工人的资本家所拥有，而这些资本家除非得到利润，否则是不会为工人垫付工资的。因而，这里的分配问题并不与技术关系相连，只是源自于生产方式的所有权，它服从于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进行生产以获取利润这样一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样，商品交换就从“实体劳动”转变为“支配的劳动”，¹¹即劳动（劳动力）为资本家所购买和支配以获取利润，而劳动者的产出就被划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为支付给劳动工人的工资，另一部分则是由预付工资给劳动工人的资本家所获取的利润。即：

$$Y=W+II=wL+wLr=wL(1+r) \quad (II: \text{利润}; r: \text{利润率})$$

通过将价格等于工资支出乘以利润率，斯密把资本品“还原为有时期的劳动”，从而由实体劳动决定的价值就转变为成本乘以统一利润率的生产价格了。需要说明的是，这种经过斯密所区分的两种社会的不同“劳动”，实际上表明了两种不同的经济制度所决定的收入分配是不同的，而这种收入分配的社会关系将决定生产的技术关系中的成本-收益计算。其中，在资本主义以前的商品经济中，其成本是“耗费的劳动”；而在资本主义经济中，资本家或企业则以“支配的劳动”计算成本，从而要求比例于垫付的资本价值获取统一的利润率。

如果具体到资本积累出现之后的资本主义社会，则斯密理论所要表述的是通过资本所有权和“自然利润率”来决定相对价格和收入分配。其中，正常工资是按照最低限度的生活资料来解释的，从而正常利润率就是在此基础上所确定的剩余量；然而同时，他又主张资本家之间的竞争状况决定利润率，并且伴随着积累过程，竞争强度的增加会使得“普通利润率降低到尽可能低的程度”（斯密，1972年）¹²，这就使得工资率与利润率这两个分配变量又彼此独立决定而互不影响，显然与上面的分析产生了矛盾。其实，这里的问题在于斯密的假设条件。在斯密的理论中，国民财富取决于两个关键因素，一个是生产性劳动与非生产性劳动的比例，另一个就是由社会劳动分工所给定的技术或稳定状态的假设。也就是说，斯密的理

论只有在给定的技术或稳定状态的假设下、即仅仅在单一产品模型中才能够成立；一旦脱离了稳定状态或发生了技术变动、进入了异质品模型，斯密的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可以作为衡量财富价值尺度的“支配的劳动”就会随之变动，因为这个衡量标准并不能独立于相对价格和收入分配的变动。这样一来，其利润的推导就会成为一种循环推论，而不能决定资本品的相对价格和收入在工资与利润之间分配的份额了。

3、李嘉图

李嘉图把价值和分配理论转向了宏观总量。与斯密不同的是，李嘉图并不是要论证一种“自然利润率”所决定的相对价格和收入分配，而是要讨论利润率和收入分配的变动问题。所以，他摒弃了斯密提出的价格是工资与利润之和的“生产成本理论”，即工资率 w 与利润率 r 的决定互相独立。相反，他认为分配的变量，特别是实际工资率与利润率之间是一种相互影响的反向变动关系，“付给工人的劳动成果越大，利润率的份额必然越小，反之亦然”（李嘉图，1979年）¹³。在李嘉图的价值和分配的分析中，社会剩余是他作为一个古典学者分析利润率如何决定的基础，所以他将分析集中于作为剩余残余部分的利润，并使用了单一产品模型——谷物模型来表明其中的经济关系。假设单一要素——劳动的投入，生产单一产品——谷物，生产周期固定（比如为一年），资本是一笔谷物基金，用于支付雇佣工人投入的劳动。由于资本（即工资基金）和产出（即谷物）都是由谷物组成，所以这里的资本与产品之间存在着物质的同质性。于是，谷物生产的利润率就仅仅依赖于谷物的生产条件以及构成工资率的谷物量，而不由价格确定。这样，李嘉图的“谷物”比斯密的“支配的劳动”在作为衡量单位上是更为合适的，因为同质性使得谷物的利润率可以独立于价格而存在。这样，假定 $W=wL$ 为预付工资基金，则该商品以谷物表示的价格即是：

$$P=W(1+r)=wL(1+r) \quad (r: \text{农业利润率}; w: \text{谷物工资率}; L: \text{就业劳动者人数})^{14}$$

那么，利润率 r 则是社会剩余 S 和必要消费即工资支出 W 的比率，即： $r=(Y-W)/W=S/W$

可以看到，上式中利润率的计算并不要求价格体系的存在，而只是产出与工资之差额即剩余同预付工资基金的比率，所有这些量都以实物（谷物）来表示。所以，在李嘉图单一产品的谷物模型中，农业利润率只是一个纯粹的数字比率，它独立于价值的存在；一旦由单一产品模型进入异质品模型，即当原先在谷物生产中曾经都是用谷物所表示的工资品和资本品开始由谷物以外的其他商品组成时，利润率的决定就不得不面对价值的问题。因为此时，工资以及整个资本的量值取决于商品的价格，而相对价格中包含了利润率的变动。为了决定利润率的大小，就需要把异质剩余产品和异质资本这两种总量表示为同质的量，这就需要依靠价值理论来提供一种解决办法。李嘉图解决这个问题的巧妙手段在于，他把商品的交换价值同生产这些商品直接或间接需要的劳动量连接在一起，即采用同质的劳动时间作为计量单位来表示剩余和剩余量的决定，从而引入了劳动价值论。于是，社会剩余产品和预付资本的总量就可表示为劳动数量，而这些劳动数量相对于社会产品分配的转变则是恒定的。不过，一旦把分配变化对交换价值的影响考虑进来，情况就变得复杂了。这时，用任何既定标准衡量的社会产品的价值和剩余产品的价值，即使在社会产品的物量保持不变的条件下，一般也会随分配的变化而发生变化。这样，工资、剩余产品以及利润率之间的直接变化关系就会随着异质品模型的引入而变得相互影响。这使得李嘉图不得不面对一个令他十分困扰的事实，即：由于资本和劳动在不同产业按照不同比例结合（ K/L 不同），货币工资的任何变化都会改变相对价格的构成。因此，相对于资本密集型产品的价格而言，工资的上升或利润率的下降都会使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价格升高。这就违反了李嘉图所试图遵循的劳动价值论。根据该理论，相对价格决定于生产中耗费的物化劳动量，而与劳动报酬率无关。为此，李嘉图想到可以用一种由整个经济中加权平均的 K/L 比率生产出来的商品来表示所有价格，而该商品能提供一种不受工资与利润比例变动影响的衡量标准，因而形成“价值的不变标准”，这时总量的大小就不会随分配的变化而变化。然而，现实中的所有商品并不是在相同情况下生产出来的，不可能找到以加权平均的 K/L 比率生产出来的这种特殊商品。因此，连李嘉图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实际上不存在完善的价值尺度”（李嘉图，1979年）¹⁵，不存在不变的价值标准。

另外，作为一个古典学派的代表人物，李嘉图虽然采用了抽象掉技术来表明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古典剩余分析方法（如将利润作为总产出减去地租和生存工资的剩余），但在地租的决定上，他却不自觉地采用了土地随收益递减的技术分析（后来的新古典边际生产力分配理论正是源自于此），从而导致了其分配理论的逻辑混乱。这里仍然采用李嘉图 1815 年《论利润》的谷物模型。假设总资本的数量给定为上一年收获的谷物（ Y_{t-1} ），所能雇佣的劳动数量 L 取决于工资率 w ，工资率固定且小于劳动生产率（ $w < \sigma$ ），从而投入劳动的数量 $L = Y_{t-1}/w$ 。假设规模收益不变，则这一年的总产出 Y_t 和利润率 r 为：

$$Y_t = (Y_{t-1}/w) \sigma = L \sigma$$

$$r = (Y_t - Y_{t-1}) / Y_{t-1} = (L \sigma - wL) / wL = (\sigma / w) - 1$$

（ Y_{t-1} ：上期产出； Y_t ：当年产出； w ：固定工资率； σ ：劳动生产率； L ：雇佣劳动数量；剩余： $Y_t - Y_{t-1}$ ）其中，第一个公式表明总产出取决于投入的劳动和劳动生产率，第二个公式表明利润率取决于工资率和劳动生产率。可以看出，这个单一产品的谷物模型只是一个总量模型，其中并没有相对价格问题。当加入技术变动后，如随着土地收益递减，劳动生产率下降，必然会导致利润率下降；同时，如果工资率下降，利润率则会上升。在这里，李嘉图所引出的分配规律实际上为两种，即：一个是生存工资和利润率，由社会关系决定，利润是资本家所得的剩余；另一个是利润由劳动生产率、进而由技术决定。也就是说，李嘉图所讨论的是两种变动下收入分配的变化。不过，如果是所有的量都由谷物表示的单一产品模型，则利润率的变动还不会影响相对价格；一旦扩展到异质品模型，当各个部门 K/L 不同或资本构成 c/v 不同时，技术关系上的劳动生产率的变动和收入分配中的利润率的变动就会同时影响相对价格，从而不能得到一个统一的尺度来测量总量的收入分配和利润率的变动。所以，关键在于必须把总量与技术彻底分离，即作为总量的价值和分配理论与技术是完全无关的，仅仅取决于资本主义特定的经济关系。

4、马克思

马克思从李嘉图那里继承了劳动价值论，同时也扩展了这一分析工具。他批评了李嘉图把劳动价值论与技术上的劳动生产率相联系的做法。相反，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所表述的价值与技术是完全无关的（不包含任何使用价值的原子），只是表示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同时，与价值相联系的收入分配也只与抽象劳动有关，而与技术无关。在资本主义经济中，价值转化为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以劳动为基础的交流就转化为以剩余劳动或获取利润为基础的交流关系。这是马克思使用抽象方法分析价值理论所得到的结论，即抽象掉所有的其他因素（如使用价值和劳动生产率），把价值归之于劳动时间，以此来表明资本主义条件下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即资本家雇佣劳动工人进行生产的目的是为了获取利润，也就是剩余价值来源于剩余劳动这样一种特殊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所以，马克思认为，在一个以利润为生产目的的资本主义经济中，相对价格、分配、再生产以及资源配置等问题都是服从和服务于这种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这种总量上的经济关系与技术是完全无关的。

在此基础上，马克思阐述了有关资本主义利润与剥削的分配理论。依据该理论，如果商品是按照生产它们所需的劳动时间量实行等价交换，那么工资就可以直接衡量生产工人为了维持生存而购买的商品所需的劳动时间（即劳动力的价值 v ），而利润作为工人所增加的价值与工资之间的差额，也同样可以直接衡量超过劳动力价值的剩余劳动时间所生产的剩余价值 m 。这样，剩余价值与劳动力价值之比率为 $m' = m/v$ ，即马克思的剥削率，也就会直接反映在利润与工资的比率之中。这表明了利润的源泉是在于占有货币资本的资本家拥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所有权，因而可以迫使雇佣工人进行剩余劳动。由于马克思区分了由生产工具构成的“不变资本 c ”和由工资构成的“可变资本 v ”，从而避免了李嘉图未能清楚的认识这两种资本的比例作为利润率的决定因素之一而带来的失误。这样，李嘉图的利润率公式 $r = (Y - W) / W = S / W$ 可以被下式取代：

$$r = m / (c + v) = (m/v) / [(c/v) + 1] = m' / [(c/v) + 1]$$

可以看到，在马克思的公式中，利润率 r 的计算取决于剥削率 m' 和资本有机构成 c/v 的大小

(这里的资本有机构成 c/v 与上述资本劳动比率 K/L 是一致的)。然而, 由于不同的商品涉及到不相同的资本有机构成 c/v , 会使得商品按价值进行交换与相同的利润率之间出现矛盾。按劳动时间实行等价交换必然意味着, 一个行业内的资本家所得剩余价值 m 等于其工人生产的 m ; 但倘若 c/v 在各行业不同, 则随着某一行业 c/v 的高低, 该行业工人生产的 m 就会表现为相对于所用资本或低或高的利润率, 即各部门利润率不相等。但这种情况在竞争趋于一致的条件下是不可能存在的。马克思的解答是, 指出商品不按价值而按生产价格进行交换, 以确保在资本有机构成 c/v 各不相同的条件下仍然能使各部门利润率相等。¹⁶ 他先计算出一般利润率为: $r = \sum mi / \sum (ci + vi)$, 这样生产价格就成为: $P = (1+r)(ci + vi)$ 。由于这个价格仅仅是转换了的价值, 而利润则是重新分配的剩余价值, 所以马克思认为, 这里有两个总量关系始终成立, 即: “生产所有不同领域的利润总和因而必然等于剩余价值的总和; 同时全部社会产品的生产价格的总和必然等于其价值的总和”(马克思, 1867年)。¹⁷

然而, 后来的一些经济学者, 例如博特基威茨 (Bortkiewicz)、斯威齐 (Sweezy)、西顿 (Seton) 等人相继指出, 马克思对于转形问题的解答是不完整的。他们几乎一致认为, 马克思的解答只是转换了产出品价格, 而投入品的价格还是价值的形式, 而资本家一般却要按价格、而不是按价值购买投入品, 所以这个“转换”是个不充分的答案。但是, 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来看。在马克思对于转形问题的分析中, 其关键是马克思在生产价格之前独立地确定了一个一般利润率。他认为, 正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产生使得上述简单商品交换中“耗费的劳动”转变为资本主义条件下“支配的劳动”, 才使得劳动力为资本家所购买和支配以获取利润, 从而价值才转化为统一利润率的生产价格。也就是说, 这个一般利润率来自于资本主义总量的经济关系。所以, 在资本主义经济下, 始终存在着来自于资本家可以按照预付资本价值在各个部门获取统一收益率的这样一种一般利润率。这样, 由这个一般利润率所决定的总量, 包括价值和剩余价值总量、以及工资率、利润率等各种宏观指标的存在, 都不再依赖于相对价格或任何技术关系, 只取决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实际上, 马克思对李嘉图价值分配理论的修正, 本意也正在于此, 即要把技术关系与收入分配完全分离开。不过, 需要说明的是, 马克思在讨论利润率下降规律时又采用了资本有机构成的分析, 而这种有机构成究竟是价值构成, 还是“反映技术构成的价值构成”是不清楚的。所以, 如果这种有机构成是一种技术关系的话, 就会使得总量关系与技术无法彻底分离, 从而产生了前后的不一致。显然, 这才是马克思转形问题的解答之所以不完整的最根本原因。不过, 后来的很多学者往往忽略了马克思所讨论的总量的收入分配和利润率问题, 而只是从相对价格的角度来解释马克思的价值理论, 并把相对价格联系到收入分配, 也就误解了马克思的原意。

5、斯拉法

斯拉法的著作《用商品生产商品》(1960) 曾因引发极为复杂的“剑桥资本争论”而闻名于世。一般认为, 该作品在经济分析史中的贡献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个是他以新古典总量生产函数为对象而为批判当时流行的边际(新古典)分析方法提供了主要基础 (Harcourt, 1969; Kurz, 1985); 另一个是他重新采用古典经济学的剩余分析方法而掀起了对古典分析传统的复归* (Meek, 1973; Dobb, 1973)。¹⁸ 斯拉法的分析是从特定的正在使用中的生产制度开始的, 其中的商品都是通过商品资料生产出来的, 其整个体系由一系列线性生产方程组成, 每个方程式用于经济过程中的一种商品以表明生产的技术关系。他认为, 在不考虑需求形式时, 这些方程式足以决定所有长期均衡的相对价格, 不过其条件为: (1) 给定每种商品的产量; (2) 整个经济中资本的利润率一致; (3) 实际工资率 w (或资本的利润率 r) 在某种程度上是外生给定的。其中的关键是统一的资本收益率(利润率)概念, 或进一步把“自然价格”定义为产生于统一利润率、并被产业间资本流动平均化的静态均衡价格。一直以来, 它们都是古典分析传统中的重要概念, 在这里也是斯拉法体系所不可缺少的。

事实上, “要求回到古典传统”的斯拉法体系的构建, 源自于他希望解决“不变的价值标准”给李嘉图带来的困扰。按照李嘉图的解释, 这个“标准”不会受到由于分配变量的变动而导致相对价格的变化所带来的影响。不过, 据前所述, 李嘉图并没有找到这个标准; 但

斯拉法却通过其方程体系的求解，用一种“标准复合商品”解决了李嘉图的难题。简单的讲，其价格体系可表示为：

$$P=(1+r)AP+wL \quad (P: \text{正常价格列向量}; A: \text{投入-产出矩阵}; L: \text{直接劳动投入}; w: \text{统一工资率}; r: \text{统一利润率})$$

他对这个结论的解释建立在对“基本商品”与“非基本商品”加以区分的基础之上。其中，前者直接进入包括这些商品本身在内的每一种商品生产的过程中，后者则只进入最终消费。依据这一划分准则，斯拉法所得到的“标准复合商品”只由其中的基本商品构成，它们一起以“标准比率”进入生产，而这个标准比率与其进入自身生产过程的比率相同。这样，当与生产技术完全无关的工资的变化改变了利润率时，却可以不影响以标准商品衡量的相对价格。因为这种变化在改变价格形式时同样改变了衡量尺度，而斯拉法所使用的“标准复合商品”是由以相同比例结合的产品组成，所以它可以提供一种不变的“价值标准”来解决困扰李嘉图的难题。斯拉法认为，这种“复合商品”不但存在于现实的经济制度之中，而且其净产出进入工资的比例即可以决定整个经济中的利润率，此时经济的实际净产出就成为一个价值标准 (numeraire)，即等式：

$$P(I-A)y=1 \quad (y: \text{总产出向量})$$

同时，由上面两式可以证得：

$$r=R(1-w) \quad (R: \text{最大化利润率})$$

(Newman, 1962; Pasinetti, 1977; Woods, 1978) ¹⁹

这样，斯拉法就成功的在其投入-产出向量的矩阵上加入了一个表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统一利润率。

通过上面的价格体系，斯拉法清楚的表明了新古典的逻辑悖论。首先，上述最后一个等式所表述的实际工资率-利润率曲线 (w-r 曲线) 是一条向下倾斜的直线，如前所述，这对于单一产品模型是成立的，但在异质品模型中，由于价格会随收入分配的变化而变化，因而难以成立。这里也可以看到，在等式 $P=(1+r)AP+wL$ 中，当最大化工资水平即 $r=0$ 时，相对价格 P 是同其劳动成本 wL 成比例的；而在 $r>0$ 时，相对价格 P 一般会脱离有关劳动成本而随着 r (或 w) 的变化而变化。所以，只有在一切行业生产资料对劳动 (K/L) 保持相同比例、也就是单一产品模型的特殊情况下，对各种水平的 r (w) 来说，价格才会与劳动价值成正比，即相对价格会对收入分配保持不变；到了异质品模型中，由于各个部门的 K/L 比不同，就会使得选择不同的利润率而带来技术再转折与资本倒转问题。其实，斯拉法的结论之所以引人注目，也正是在于他采用了这种特殊的价格体系方法，证明了资本品与资本结构的不同一性 (即不同部门 K/L 不同) 会随着利润率 r 和单位工资 w 的变化而正常的出现“价格运动几上几下的复杂模式” (斯拉法, 1960 年) ²⁰，反过来这种现象又会以一种单调的方法引起一般与利润率无关的“资本量 K ”的变化。前述新古典的逻辑悖论就是这样来源于异质品生产模型的一般特性，后来的新剑桥学派也正是利用了这一点来批判新古典的分配理论的。

事实上，如果不加入统一利润率的假设，斯拉法的模型即是新古典一般均衡模型所要表述的内容。如前所述，在新古典单一产品模型中，瓦尔拉一般均衡的技术选择是根据人们的消费偏好和要素稀缺性来选择投入-产出系数的，由此所决定的相对价格就可以使资源得到有效配置；同时，由于资本品是异质的，从而不存在统一的利润率，当然也不存在任何总量的收入分配。但是，由于一方面新古典的技术分析所讨论的只是生产的一般，它完全排除了特定经济制度下所决定的各种总量关系；另一方面，更为接近于现实生活的只能是包括各种产品在内的异质品模型，而不可能永远是新古典的单一产品模型。所以，新古典的分配理论并不能真正表明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现实经济关系。为此，斯拉法加入了表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统一利润率的假设，即按照资本价值的预付获得统一利润率的要求给定各个部门一致的利润率。这样，各种异质的资本品或各个部门的不同的资本劳动比 K/L 将被“资本化”为一种同质的“投入”总量；同时产出也成为一种同质的总量，其比例于投入总量而与利润率相

联系。这样，在斯拉法加入了统一利润率的“标准商品”模型中，由于无论技术关系（投入-产出系数）如何变动，其由利润率所决定的投入和产出总量都将保持不变比例（即抽象掉了技术关系），这样利润率和收入分配（ r 与 w ）的任何变动，都只是影响总量的投入-产出比率的变动，而不会影响到相对价格。显然，这也就恰恰表明了古典学派与马克思经济学的核心命题，即技术关系与作为总量关系的收入分配是完全无关的。不过，正如在新古典单一产品模型中加入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统一利润率就会带来技术再转折与资本倒转等逻辑悖论一样，如果在古典一般均衡模型中加入技术关系，如李嘉图所要寻找的同时表示技术关系和收入分配的“价值标准”，以及马克思的转形问题和利润率下降问题所引入的资本有机构成 c/v 等，也同样会遇到类似于技术再转折的逻辑矛盾。因为只有在完全抽象掉了技术关系的斯拉法“标准体系”中，古典学派的逻辑才是成立的。

现在的问题是，斯拉法的以“标准商品”为核心的“标准体系”在现实经济中是否真正存在呢？由上可知，斯拉法的《用商品生产商品》可以说是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李嘉图关于存在“不变的价值标准”的观点，而且用这种“不变的价值标准”即可以区分和衡量因工资率和利润率的变化引起的技术变更的效果。不过在李嘉图的体系中，这个“不变的标准”所具有的特性是，它不仅不随着工资和利润的改变而变化，同时也不随其自身生产方式的变更而变化。然而现在，斯拉法的“标准商品”虽然在第一点上符合要求，但在第二点上却无所作为，因为随着生产技术的变化，其自身即会发生改变，从而并不能真正解决李嘉图的难题。所以，事实上并不存在这么一个“不变的标准”以满足所有李嘉图强加其上的要求（Ong, 1983），斯拉法的所谓的“标准体系”也就不可能真正存在了。²¹

四、宏观经济的分配理论

自19世纪70年代以来，以生产函数为基础的新古典理论因其技术分析一直是支配人们思想的主导范式，而被应用于所有经验问题的研究。不过，正像凯恩斯所表明的，新古典经济学研究的并不是现实中的货币经济，而只是一种实物经济，如瓦尔拉一般均衡理论中的实际量值与货币量值是截然分开和完全无关的。所以，其只限于抽象技术关系的命题并不是对现实经济的解释，一旦试图解释现实问题时就会遇到难以克服的矛盾。由斯拉法所复兴的古典学派和马克思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的方法论启示是，新古典理论所讨论的技术关系只是生产的一般，而不能表明特定经济关系下生产的特殊性或社会关系，所以必须加入统一利润率的假设来表明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然而，他们却没有充分认识到这种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货币本质，没有表明其价值和分配理论所具有的货币性质与以利润率为基础的成本-收益计算之间的关系。事实上，这种以货币为基础的价值和分配理论可以从凯恩斯“货币的生产理论”中得到启示。凯恩斯曾试图把货币理论与价值分配理论结合起来，但新古典理论却抛弃了凯恩斯的革命性见解，不但完全将其嫁接在瓦尔拉一般均衡之中，还把货币作为一种外生变量来对待。其实，在现实的资本主义经济中，货币不仅是内生的，而且也是决定所有经济关系的本质所在，宏观经济只有通过内生的货币供给才可以形成一个整体，进而决定所有的价值和分配变量。所以，当我们所要讨论的问题是现实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均衡和效率时，就必须把货币经济的性质作为理论分析的基本假设。这样，由李嘉图、马克思和斯拉法所要表明的各种总量经济关系和价值分配关系，就可以通过加入货币以及统一的货币利息率来得到更为有效的解释，由此所形成的宏观经济的收入分配理论，也才是真正可以解释现实货币经济或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分配理论。

1、对新古典的修正：利润率均等化

如前所述，新古典边际生产力分配论的一个基本原理，是厂商根据生产要素的边际产品等于其价格这种利润最大化进行决策。然而，这一主流经济学的教条并不适用于资本主义经济，由此导致了其分配理论的一系列逻辑混乱。这里仍然采用前面古典学派的单一产品（谷物）模型来推导，但要修改其中谷物资本全部用于工资的假设。假定谷物（资本）除雇用劳动预付工资 $W=wL$ 外，还可用作资本品 K （如种子），则上一年的谷物资本 $Y_{t-1}=wL$ 就成为

$Y_{t-1} = wL + K$ 。这样，利润率的公式即是：

$$r = (Y_t - Y_{t-1}) / Y_{t-1} = [L\sigma - (wL + K)] / (wL + K)$$

这里的利润率 r 不仅取决于劳动生产率 σ 、工资率 w ，而且取决于用于种子的数量 K 。给定 w ，则 r 与 σ 成正比和与 K 成反比。用于种子的资本 K 越多，所能雇用的劳动 L 越少，除非随着 K 的增加会使 σ 提高，否则资本家是不会把资本用于种子的。也就是说，这里的资本 K 与劳动 L 之间，涉及到了由于相互替代而带来的如何把资本在劳动与种子之间进行分配的问题。其中，资本家投入生产过程的货币资本 Y 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用于预付工资 $W = wL$ ，一部分用于购买种子 K （或机器），即： $Y = wL + K$ 。同时，模型中总产出的最大化也就是利润率的最大化，利润率 r 等于产出增长率 g 。当资本家根据利润率最大化的原则决定劳动与种子的替代时，可以通过求极值的方法得到资本家选择种子与劳动替代的原则，即：

$$MPI = w(1 + r)$$

$$MPk = 1 + r$$

这两个公式表明，资本家对种子与劳动的替代或资本劳动比 K/L 的选择是使劳动的边际产品 MPI 等于工资率加上工资率乘以利润率，以及使种子（资本品）的边际产品 MPk 等于超过其损耗的利润率或使其增加的产出等于利润率（柳欣，1994年）²²。其含义是，资本家的利润最大化是使每一个单位谷物资本用于种子 K 或雇用劳动 L 所得到的利润率均等。这样，由此得到的工资率和利润率的公式即是：

$$w = MPI / (1 + r)$$

$$r = (MPI / w) - 1$$

显然，这不是由新古典边际原理所得到的要素价格等于其边际产品，即： $w = MPI$ 和 $r = MPk$ 。因为，这里是“支配的劳动”或给定的工资率（或利润率），而模型中的资本并不是作为资本品的种子，而是作为总资本的谷物。资本家使用给定的谷物资本既雇用劳动又购买资本品，这就使得模型中的成本—收益计算与纯粹技术关系中的新古典生产函数完全不同了。也就是说，消费时间偏好的选择不再是种子和劳动的边际生产力，而是种子与雇用劳动工资支出的统一的利润率。由于统一利润率的存在，资本就不再是新古典的作为生产要素的资本品，而是用于购买劳动和资本品的“总量资本”，或者说成为古典学派“预付资本”的概念。斯拉法的模型也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即给定投入—产出的技术关系（其投入可以扩展到固定资本和土地），当加入统一的利润率时，资本和劳动两种生产要素的投入都被“资本化”而比例于利润，这就与前面单一产品模型的假设相同。所以，新古典的逻辑错误并不在于单一产品模型，而在于异质品中使用统一利润率所作的价值加总。因此，就总量关系而言，技术关系与收入分配是完全分离的，总量的收入分配只是产生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

2、对古典的补充：货币经济

斯拉法曾经使用一种外生给定的利润率，以表示古典学派和马克思经济学所强调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但他并没有明确表明这种总量关系中的利润率是如何决定的，不过他建议为了分析资本主义经济的现状，最好将利润率当作一个可以由货币的利息率决定的独立变量（斯拉法，1960年）²³。那么，这种外生给定的利润率是否与货币有关呢？按照马克思经济学的解释，事实上决定资本主义经济中收入分配和总量关系的，正是这种货币利息率，它来自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货币经济的本质。这里理解的关键，是资本主义经济下货币与资本的关系。这是因为，首先从交换的基础看，它来自于劳动价值论中不同商品相交换所依据的一个同质的东西——劳动，而劳动时间的凝结所表示的价值是通过货币来表现的。其次，在一个交换经济中，买卖双方必须拥有货币以签订契约来保证交易的进行。当然，正是因为这种契约性质的存在，使得货币成为一种特殊的信用关系或最简单、最直接的信用关系。这样，每个人所占有的货币或信用关系将决定其签约的能力或支配能力。最后，更为重要的是，在资本主义经济中，货币在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所买卖的不是劳动、而是劳动力这种特殊的商品。它不仅使得在拥有货币资本的资本家与不拥有任何生产资料而只有劳动力可以出卖的工人之间的交换关系得以维系，而且能够为资本家带来利润，即货币的增殖。所以，如果

假设存在着一种由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所决定的利润率，则这个利润率必定是一个货币利息率，即总量上的货币增殖的比率，而不是一种实物上的资本的边际生产率。因此，在古典学派有关分配理论的模型中，是不可能脱离开货币和货币利息率的。

然而，不论是传统的货币数量论，还是新古典的一般均衡理论，其中的货币都只是一种“面纱”，它的引入不会影响经济的运行，即货币是附加和无用的。²⁴但在现实的资本主义经济中，货币当然是至关重要和不可否认的，因此，凯恩斯的货币理论试图要冲破这些传统的货币数量论。1936年，凯恩斯的名著《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问世。他在该书中写道：“经济学一方面分为价值论和分配论，而另一方面分为货币论，这种分法我认为不正确”。²⁵所以，他否定了新古典理论中货币变量与实际变量之间的两方法(dichotomy)，以建立一种把货币理论与价值、分配理论或产出、就业理论联系起来的新的货币价值理论。其中，凯恩斯使用工资单位作为价值的计量标准，以根据特殊劳动者的报酬来换算它的劳动时间。这样，如果 M 代表工资（和薪金）总额， W 代表工资单位，而 N 代表就业量，即： $M=N \cdot W$ 这里的 M 是用货币数值表示的国民收入，工资单位 W 则联系到货币对劳动的支配力，所以是劳动货币化的一个表示。这样，凯恩斯通过把货币价值的量与就业量这两个基本数量单位联系在一起，表明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货币性质。²⁶实际上，凯恩斯所使用的工资单位 W ，完全可以看作是李嘉图终生寻找、但始终未能找到的“价值的不变标准”。而且，由于它同时联系到了货币与劳动、即对劳动货币化的表示，所以又是比斯拉法仅从价格体系中推导出来、却无法与劳动相联系而得出的“标准商品”更为合适。这样，凯恩斯就通过强调资本主义的货币经济而运用的这个工资单位 W ，解决了困扰古典学派价值和分配理论的一个难题。

同时，凯恩斯还提出了与新古典理论用于加总的实物的利息率（资本的边际生产率）完全不同的一种利息率，即把“货币的自己的利息率”作为一般利息率来实现加总问题。在《通论》著名的一章（凯恩斯，1936年，第17章）里，凯恩斯以这个“货币的自己的利息率”（own rates of interest）作为其宏观经济学和货币理论的基础，从而把货币的信用关系归之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这与古典学派对统一利润率的强调则是一致的。通过给定这个自然利润率或货币利息率，即可以决定货币供给和收入流量，从而得到现实中的各种宏观变量（包括经济增长率、储蓄、投资、工资率等按货币价格计算和价总的统计资料）。显然，这些宏观变量只是一种表示社会关系的货币量值，与新古典的生产函数所表示的实物量值并不一致。由此，把国民收入核算体系的统计资料仅依附于生产函数和实物经济的新古典理论，不但偏离了凯恩斯把价值、分配理论与货币理论联系在一起的研究方向，同时也抛弃了市场经济或马克思经济学所强调的资本主义货币经济的本质。

3、收入-支出模型的修正与收入分配变动的有效需求问题

在现实的资本主义经济中，企业以获取利润为目的的成本-收益计算通过货币量值来计量，从而决定了所有的宏观变量与技术无关，只取决于特定的货币金融体系。由此，只有加入了表明资本主义货币经济的成本-收益计算的收入-支出模型，才能以存量与流量的同时均衡说明宏观经济的收入分配关系。相反，由新古典生产函数所表示的实物的投入-产出关系和实际变量所组成的模型，只是一个流量模型，无法将货币加入其中来表明现实的资本主义经济或货币经济。例如，新古典的收入-支出模型为：

收 入=支 出

$$C+S+T=C+I+G \quad (C: \text{消费}; S: \text{储蓄}; I: \text{投资}; T: \text{税收}; G: \text{政府支出})$$

假设 $T=G$ 。采用古典学派的消费 C 来自于工资 W 、储蓄 S 来自于利润 R 的假设，则有：

$$W+D+T+R=C+I+G \quad (W: \text{工资成本}; D: \text{固定资产折旧}; R: \text{营业盈余})$$

其中的营业盈余 R 为 GDP 减去成本 $(W+D)$ 和税收 T 的剩余。这样，若给定企业的成本和税率，则总支出 $(C+I+G)$ 的变动将决定企业是否盈亏。按照新古典理论，上式中假设存在着一种充分就业的收入水平，作为一个实际变量，它取决于生产函数中的资本、劳动投入和技术进步。然而，实际资本主义经济中的 GDP 却是一种货币量值，而不仅仅是实物，所以要想知道充分就业的收入水平，不仅需要测量生产函数的变动，还要区分开实际变量与名

义变量（价格水平）的变动。但由于新古典生产函数固有的逻辑矛盾，使之在经验上从来没有或根本不可能在实物上加以检验。这样，新古典的单一流量模型就无法使用存量与流量的同时均衡来表明现实中的资本主义经济或货币经济。

现在，把能够表明市场经济或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成本-收益计算加入到收入-支出模型中，修改上述模型，主要是加入了资本存量价值 K ，即通过 K 的变动来实现流量与存量的同时均衡。例如，在等式 $W+D+T+R=C+I+G$ 的左端，折旧 D 取决于折旧率和资本存量价值，即： $D=dK$ ，其中 d 为折旧率， K 为按价值计算的资本存量；营业盈余 R 可划分为利息 r 和利润 π 两部分，即： $R=r+\pi=iK+\pi$ ，其中 i 为利息率，是由企业在借入资本或在股市筹资时的契约所决定，可等同于市场利息率，从而 iK 为企业必须支付的利息成本。这样， π 为企业付息后的利润，即： $\pi=R-iK$ ，则有下面的等式成立（柳欣，1999年）²⁷：

$$W+D+r+\pi=C+I$$

$$W+(d+i)K+\pi=C+I$$

其中，企业的成本构成包括劳动者报酬即工资成本 W 、固定资产折旧 D 和利息成本 r ，企业的收入即利润 π 。这样，企业的行为就取决于其成本收益，即投资由利润决定， $I=f(\pi)$ ，利润大于零 $\pi>0$ ，则增加投资 I ；利润小于零 $\pi<0$ ，则减少投资 I 。假定折旧率与利息率不变，则上述模型的均衡条件为：经济增长率 g 不变，资本产出比 K/Y 不变，工资与折旧之比 W/D 和消费与投资之比 C/I 都不变，从而劳动投入 W 与财产性收入 $(r+\pi)$ 的比是不变的。同时，由于 $\pi=0$ 即 $\pi=R-iK=0$ ，所以有： $R/K=i$ ，即上述稳定状态的增长条件又来自于资本存量 K 与收入流量 R 之间的关系。这样，如果把今年以前发放的贷款称之为资产 K ，而把今年新发行的贷款称之为收入 R ，在资产与收入之间就存在着一个表明市场经济或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重要因素，即货币利息率 i ，一旦利息率 i 给定，则稳定状态增长率将取决于这个货币利息率，正是它决定着模型中存量与流量的同时均衡。

上述模型的稳定性存在着一个内在的机制，即本期的投资流量将转化为下一期的资本存量。首先投资的前提是有一笔货币资本，其中一部分用于雇用工人，一部分用于非人力投资（购买机器、设备等）。当投资的增加使经济增长率 g 提高时，一方面，经济增长率 g 的提高将使利润 π 增加，另一方面，增加的投资将转化为下一期的资本存量，令资本存量的价值 K 增加，这会带来折旧成本 $(D=dK)$ 和利息成本 $(r=iK)$ 的增加。这样，当经济向上波动和投资增加时，必然是一方面使得资本存量 K 与收入流量 R 的比率、即利息和利润在总收入中的比重提高，而工资在收入中的比重、即工资对利息（加利润）的比率 $W/(r+\pi)$ 下降，从而使消费倾向下降或储蓄率提高；另一方面，又使得企业的固定成本 $(D+r)$ 相对于可变成本 W 的不断上升，即工资成本对折旧和利息成本的比率 $W/(D+r)$ 下降。这样，随着经济的增长，一方面是工人收入减少、购买力下降引起的消费需求减少，一方面是产品成本上升引起的产品价格的高涨。到了一定阶段，必然形成工人的工资买不起企业按现行成本生产和定价的产品，而如果企业降低价格则会引起亏损。这时，即使有利息率的下降，它也既不会降低成本，也不能提高需求，只会令衰退越来越严重，有效需求不足问题也越发明显了。这就是有效需求问题的核心（柳欣，1999年）。

实际上，有效需求不足问题出现的关键在于，资本存量价值的变动进入了企业的成本-收益计算，从而影响了整个宏观经济的收入分配、进而影响了消费函数才导致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就是，必须有一个体现着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健全的货币金融体系，它能够在经济出现衰退迹象时可以很快使资本存量价值和收入分配恢复原有的比率。这样，当企业亏损到一定程度时，商业银行会减少货币供给，并向企业追债而令其破产，而破产就可以使资本存量价值降低或资本贬值，从而减少下一期的折旧和利息成本，令经济重新出现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企业扭亏为盈。相反，如果没有一个健全的货币金融体系的支撑，正如当前我国处于经济体制转轨的阶段，金融体制改革尚未完成、完善的金融体系还有待逐步确立的条件下，经济高涨时亏损的企业不能及时破产，令资本存量价值大幅上涨，加之折旧和利息成本的进一步攀升，从而导致的经济衰退就会持续较长时间，使得有效

需求问题难以解决了。因此，在以利润为目的的现实资本主义经济或货币经济的关系下，只有通过各种手段逐步建立和完善健全的货币金融体系，才能更为有效的解决当前宏观经济收入分配关系中特有的有效需求问题。

参考文献

- [1] Blaug, M. Economic Theory in Retrospect[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 [2] Blaug, M. The Cambridge Revolution: Success or Failure?[M]. London: The Institute of Economic Affairs, 1994.
- [3] Costa, G.C. Production, Prices and Distribution[M]. Bombay: University of Bombay Press.
- [4] Dobb, M. Theories of Value and Distribution since Adam Smith[M].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3.
- [5] Ferguson, C.E. The Neoclassical Theory of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9.
- [6] Garegnani, P. Value and Distribution in the Classical Economists and Marx[C]. Oxford Economic Papers 36, 1984.291-325.
- [7] Harcourt, G.C. Some Cambridge Controversies in the theory of Capital[M].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2.
- [8] Harris, D.J. Capital Accumulation and Income Distribution[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 [9] Howard, M.C. Modern Theories of Income Distribution[M]. London: Macmillan, 1979.113.
- [11] Hodgson, G. Capitalism, Value and Exploitation[M]. Martin Robertson and Company Ltd, 1982.
- [12] Marglin, S.A. Growth Distribution and Prices[M].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 [13] Meek, R.L. Smith, Marx and After[M]. London: Chapman and Hall, 1977.
- [14] Pasinetti, L.L. Growth and Income Distribution. Essays in Economic Theory[C].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4.
- [15] Sweezy, P. The Theory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M].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0.
- [16] Steedman, I. Marx after Sraffa[M], London: Verso Editions and New Left Books, 1977.
- [17] Wood, John Cunningham. Karl Marx's Economics: Critical Assessments, Croom Helm in Association with Methuen[M], Inc., 1988.
- [19] J.伊特韦尔, M.米尔盖特, P.纽曼.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2.
- [20]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M].商务印书馆, 1972.
- [21] 大卫·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M].商务印书馆, 1963.
- [22] 马克思.资本论[M].人民出版社, 1975.
- [23]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重译本)[M].商务印书馆, 1999.
- [24] 斯拉法.用商品生产商品[M].商务印书馆, 1962.
- [25] 劳伦斯·哈里斯.货币理论[M].中国金融出版社, 1989.
- [26] 柳欣.资本理论——价值、分配与增长理论[M].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4.
- [27] 琼·罗宾逊.经济学论文集[C].商务印书馆, 1984.
- [28] 杰弗·霍奇森.资本主义、价值和剥削[M].商务印书馆, 1990.
- [29] 柳欣.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理论分析[J].南开经济研究, 1999, (5).
- [30] 柳欣.货币、资本与一般均衡理论.南开经济研究[J], 2000, (5).
- [31] 陆长平.新古典经济学的“悖论”及其反思[J].南开经济研究, 2002, (2).

On Controversies in the Theory of Value and Distribution

WANG Lu

(Nankai Institute of Economics)

Abstract: In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theory of value and distribution is always a core of pure theory of economics. All of the neoclassical school, classical school, and Marxian economics explained the problem by different thoughts and different point of views. During the long-term discussion of the theory of value and distribution, neoclassical economics couldn't justify itself because of its own logic contradiction. Although Classical and Marxian economics gave us more enlightenments on the method of research, they didn't emphasize the essence of money economy in capitalist economic relations. This essay thinks that if the theory of distribution on macro-economics comes from the summing-up of the classical analyzing method, the analysis to money economy by Keynes, and the cost-income accounting on the basis of profits, it must be a theory of value and distribution which can explain the real money economy or capitalist economic relation better.

Key Words: value and distribution; neoclassical school; classical school; Marxian economics

收稿日期: 2003-05-10;

作者简介: 王璐 (1977-), 女 (汉族), 河南人, 南开大学博士研究生。

-
- ¹ 克里斯托夫·布利斯 (Christophre Bliss), “新古典分配理论”, 《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 1 卷, 第 958 页。
 - ² Blaug, M. 1997. *Economic theory in retrospec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408.
 - ³ Harcourt, G.C. 1972. *Some Cambridge Controversies in the theory of Capital*.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122.
 - ⁴ Howard, M.C. 1979. *Modern Theories of Income Distribution*. London: Macmillan. p 113-117.
 - ⁵ 杰弗·霍杰森:《资本主义、价值和剥削》, 第 3 章, “意识形态与正统经济学”, 第 36 页。
 - ⁶ 斯拉法:《用商品生产商品》(1960 年), 第 5 页。
 - ⁷ 皮兰格罗·加列格纳尼 (Pierangelo Garegnani), “价值和分配理论中的剩余分析法”, 《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 4 卷, 第 605 页。
 - ⁸ 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 第 5 页。
 - ⁹ 马西莫·皮维蒂 (Massimo Pivetti), “古典分配理论”, 《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 1 卷, 第 945 页。
 - ¹⁰ Hollander. *The Economics of Adam Smith*, op. cit., p.116.
 - ¹¹ G.C. da Costa. *Production, Prices and Distribution*. Bombay: University of Bombay Press. p245.
 - ¹²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 第 81 页。
 - ¹³ 大卫·李嘉图:《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 第 8 卷, 第 59 页。
 - ¹⁴ 德维沃 (G. de Vivo), “谷物模型”, 《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 1 卷, 第 726 页。
 - ¹⁵ 大卫·李嘉图:《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 第 8 卷, 第 279 页。
 - ¹⁶ 亨特 (Hunt) 和格利克 (Mark Glick), “转形问题”, 《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 4 卷, 第 743 页。
 - ¹⁷ 马克思:《资本论》, 第 3 卷, 第 9 章, “一般利润率的形成和商品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 第 177 页。
 - * 注: 这也是本文将斯拉法列入古典学者而非新剑桥学派进行分析的主要原因。
 - ¹⁸ 马克·布劳格 (Mark Blaug), “古典经济学”, 《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 1 卷, 第 474 页。
 - ¹⁹ 伍兹 (J.E. Woods), “价值标准”, 《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 3 卷, 第 735 页。
 - ²⁰ 斯拉法:《用商品生产商品》(1960 年), 第 37 页。
 - ²¹ Blaug, M. 1997. *Economic theory in retrospec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139.
 - ²² 柳欣:《资本理论——价值、分配与增长理论》, 第 7 章, “收入分配”, 第 384 页。
 - ²³ 斯拉法:《用商品生产商品》(1960 年), 第 33 页。
 - ²⁴ 参见劳伦斯·哈里斯:《货币理论》, 第 4 章, “货币数量论与一般均衡理论”。
 - ²⁵ 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重译本), 第 21 章, “价格论”, 第 305 页。
 - ²⁶ 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重译本), 第 4 章, “单位的选择”, 第 47 页。
 - ²⁷ 柳欣:《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理论分析》, 《南开经济研究》1999 年第 5 期。